

二战后泰国华人参政历程及原因分析

潘少红

On the Process of the Thai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 Affair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ir Reasons

Pan Shao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oversea Chinese in Thailand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Then it further explores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

世人对海外华人的印象之一是他们政治态度冷漠,与其辉煌的经济成就相比,其政治作为乏善可陈。但是泰国华人却是一个例外。历史上部分泰华精英就曾得到政府的重用而被封官授爵,现在泰华享有与泰人同等的公民权利,不仅可以担任公职、当选议员,甚至出任政府部长乃至当选总理,其政治参与的活跃情景非他国华人所可比拟。本文阐述二战后泰国华人的政治参与历程,浅析影响其参政的各种因素,进而分析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证明参政是促进海外华人与当地民族融合的一种较佳模式。

需说明的是,文中使用“华人”一词,不仅指已加入泰国籍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华人,还包括经历了若干代、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了的只有部分华人血统的泰国人。笔者认为,时至今日,除一部分老年华侨坚持中国籍外,绝大部分年轻人及其子女都选择泰国籍。几乎所有泰籍华人都以其泰国籍为荣,对外公开宣称自己是泰国人,或简称“坤泰”(泰人)。其中多数人已不会说中文,对中国文化也知之甚少,但在家庭内部或内心深处仍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还坚持信守华人的信仰、风俗习惯、传统规范等。有鉴于此,文章中“华人”一词所包括的内涵将是较广的。

1973 年前泰华参政情况分析

1973 年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学生运动直接促成军人政权的垮台,开启了泰国政治自由化

与民主化的进程。此后虽然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艰辛,军人干政的情况时有发生,直到 1992 年五月事件迫使军人势力脱离政治,民主选举原则才得以遵循。在这一过程中,民众政治和民主意识却由此得到传播。泰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华人参政,因此以 1973 年为分水岭来考察泰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是比较恰当的。

1. 官商联盟——非正式、间接的政治参与

官商联盟一直以来都为人所诟病,被指为是导致社会腐败的根源,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泰国政治状况及华人的处境,则应当认为这也是一种比较隐蔽的政治参与方式。担任政府要职的文职或军人官僚们,把华商当作受其庇护的人,通过对政府的控制来取得发展经济各种政策的制定权,再通过政策的倾斜来反映和维护华商的经济要求和权益。作为回报,华商给政要们掌握一部分企业股权,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收益能变为官僚和军人统治者的私利。

这种权钱交换,正是在东方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社会条件下,在民主和法制尚不完善时,华商们不得不选择的一种非正式、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造成这种畸形的官商联盟的原因是多方面,对此,笔者作如下观:

首先,泰国的政治状况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渠道的狭小。自 1932 年以来泰国大部分时间内是由军人或军队支持的民选政府来执政,二战后 20 多年间主要由銮披汶、沙立、他侬三人进行独裁统治,政党活动经常遭到禁止,即便是宪法也曾被废除。这等于阻断了通过正当渠道参政的途径。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泰国华人的处境极其可悲。泰国追随美国采取严厉的反共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全面实行军人专制独裁统治,大肆宣扬对领袖的崇拜和大泰民族主义,以此来证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华人的政治忠诚进而受到怀疑,处于尴尬状况。一旦被扣上“红帽子”或被指为“共党嫌疑”,便会倾家荡产,性命难保。为求自保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一部分上层华商便采取依附于政治权力集团,寻求政界、军界要人的保护,以此达到保护、发展企业的目的。有学者认为华人只维持非常低的政治地位,他们通常是通过贿赂或与军人官僚领导人建立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从而影响政策,这种影响通常是防御性的、暗地里进行的。

第三,经济利益是第一目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并不明显。官商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华人企业邀请军界政界人士参加董事会,一种是国营和公营企业要求华商提供部分资金和人才。华商和军政界人士双方都从这种合作中得益,可以说是“互惠互利”。五大华人金融集团的崛起与军政界要人的庇护不无关系,1972年16家商业银行中有12家董事会中有军政领导人参与,盘谷银行、大城集团等都有军人参与合作。军政界要人不仅借机扩大自身的政治势力,而且还中饱私囊,沙立死后留下巨额财产就是一例。

第四,其对政治参与的正面作用非常有限。官商联盟的行为有“官商勾结”的嫌疑,其负面作用常遭口诛笔伐,且只有小部分华人参与其中,并不代表泰华群体。尽管如此,这也是华人在泰国特定政治环境下做出应对的方式之一。

2. 直接的政治参与

1973年前泰国政治独裁专制局面决定了其国内并无民主可言,华人参政空间非常小,虽有个别华人直接参与其中,往往并不遵循民主途径,只是个人行为而已,因而不具有代表性。在看待和分析这种现象时,笔者认为应该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虚假的民主为华人直接参与政治提供微小的机会。军人政权专制独裁,但仍然需以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幌子。銮披汶政府曾解除党禁,企图以此来标榜其政权的民主;他侬为安抚民众的不满,曾于1969年颁布一新宪法和举行选举。这些有限的机会为华人直接参与政治提供机会。1946年至1975年的议院中商人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人数最少的1946年8月,商人比例为11.6%,最多的1969年2月达45.7%,1957年至1969年2月长达十多年间议会民主遭破坏。鉴于华人经济力

量的强大,进入议院的商人中有很大部分人应是华裔商人。然而,一方面泰政府并不真正施行民主,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华商过分介入政治,以免进一步加剧泰人的不满、威胁其统治基础,因此华人参与空间非常小。当然一些华人利用了这少有的几次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但大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较大的政治发展空间。如陈伟桥、吕基文等虽都是在60年代始参与政治活动,但70年代中期以后才获较大发展。

其二,部分华人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参加或组织政党,但活跃在政坛上的华人并不彰显自身华人特性,反而以泰人的姿态出现。1965年,国务院官邸秘书长沙永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在政界中,我们好些大人物并非真正的泰人,但是他们比起某些泰人还更加热爱泰国”。日本学者的调查显示了1965~1966年泰国内阁19名阁员中,中泰混血儿占12名,其中包括总理他侬、国家发展部长沙拉信等。由于他们都是中泰混血儿,且其参政历程非一般人可以比拟,把之当作华人参政的样板并不太恰当,但这反映了在讨论泰国华人政治参与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境,即由于泰国华人同化程度很高,无法对华人政治参与者的民族身份做出明确的界定。

其三,泰国政治状况决定部分华人政治参与方式往往并不遵循民主选举的途径。其中,或以军人起家,如他侬是军人,继沙立之后登上总理宝座,屏·春哈旺曾是陆军司令。或因家族网络进而参与政治,沙拉信因经营家族企业而与上层社会建立良好关系,进而活跃于政坛,1957年曾出任临时内阁总理;云达军家族在泰政坛上也相当活跃,享有“部长家族”之盛名,其家族代表性人物天良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1932年就曾任外交部长,1952年后一直任枢密院大臣,该家族其他人员也曾参与政治活动,颂迈曾于1972年任财政部副部长。这种家族网络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深远,例如朴·沙拉信的四个儿子在70年代以后都曾积极参与政治;屏家族的后代也如此,除差猜曾任总理外,另一些后辈也是政坛名人。当然,与其前辈不同,他们都必须通过正式选举才能出任要职。

1973年后泰华参政历程

1973年后,华人的政治表现越来越活跃,积极参与泰国政治生活,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作为一群体还是作为个人都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 华人华裔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华裔总理的出现表明了华人可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



据越南《经济时报》2004年1月2日报道,2003年越南进出口约448.4亿美元,其中出口约198.4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18.8%;进口约25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26.7%,贸易逆差51.5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出口额的25.9%,为越南贸易近5年来最高纪录。

事务。70年代后,尤其80年代以来,华人已较好地融合于当地社会,与泰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大批华人政治家就是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出现。据称,自1932年至1990年任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已有8人,90年代更是华裔总理辈出的年代,差猜、川·立派、班汉、他信相继出任总理,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华裔泰国人。差猜祖籍潮州,而现任总理他信祖籍福建。

华人议员、阁员众多,表明其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广泛性与普遍性。1983年大选后,4位副国务院院长中有2人是华裔,7位国务院事务部长中有2人是华裔,部长和部长助理中有7人是华裔^①。在1986年泰国大选中,有86位华裔子弟被选为众议员,成为347席众议院中最大的团体^②。1989年由94人组成的参议院中有20人为泰籍华裔,陈其文是该届参议院院长^③。1991年泰国人民代表共357人,其中华裔近百人,内阁阁员44人,有中国血统的占一半以上,包括总理差猜和多位副总理、部长、助理部长在内,担任内阁总理顾问或各部长顾问的华人数更多^④。2001年成立的他信内阁据称有华人血统者占五成以上^⑤。

虽然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但不论这些参政的华人是否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华人的文化认同,总的说来,有华裔血统的政治人物积极参政,甚至上台执政,反映了泰华作为泰国民族的一部分,已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2. 华人资产阶级成为泰各政党的支持者

在专制独裁时期,华人资产阶级依附于政治权力集团,以保护自身经济力量。然而,70年代后,越来越多企业家介入政治事务,或亲自进入政治、参加竞选,或资助、支持政党及候选人,从而在各级政治决策中产生影响。泰学者曾指出“尽管发生了1973年10月14日事件(许多学生要求所有泰国人参与国家的管理,该事件摧毁了在泰国军方、政治领导人和华人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契约),但该事件却导致了资本家的迅速增长。当前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资本家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来获得更大的势力”^⑥。

首先,部分华人政治家本身具有企业家背景。20世纪80年代连续5届炳内阁中商人比例最少的30%,最多的47.7%^⑦。许敦茂、黄闻波、班汉、他信等就是这类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代表。许敦茂50年代进入政界,1975年任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及国会主席,后任司法部长、政府副总理等职,与此同时,他也曾任盘谷银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⑧。曾在炳政府及川政府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的黄闻波也是银行家^⑨。1995年出任总理的班汉则是一位

有名望的企业家^⑩。现任总理他信曾是电信业大亨,1994年开始涉足政坛,2001年当选为政府总理^⑪。此外担任各级议员的一些华人其本身也是企业家。

其次,通过选举和资助政党参与议会、内阁,或通过各种商会成为政府决策的压力团体,以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参与政治,其作用也越来越为人所认识。“资产阶级作为政党的支持者,它还推动着国家秩序和政治变化,可以说它已成为泰国社会变革的领导阶层。”^⑫部分政治家本身与大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敦茂、黄闻波都曾任职于盘谷银行,谢国民也曾推荐正大集团副总经理阿差·刀拉暖出任工业部副部长等。80年代后三大政党泰国党、社会行动党和民主党越来越为大企业集团所控制^⑬。另外,原先由行政人员和军政领导人制订国家政策,从70年代起不得不向企业团体征求意见,证明了企业团体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81年炳政府成立一个联合咨询委员会(JPPCC)^⑭,以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第三,泰国政治民主化过程无疑刺激华人企业家参与政治的热情,且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通过民主选举和新政治体制下的参政,更能有效地保障自身利益,这比过去仅依附权利集团来得安全、有效。但同时商业与政治关系也滋生出负面影响,出现了以贿赂、政治献金换取特殊照顾的现象,腐败与贿赂现象严重。

3. 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

经战后几十年的演变,泰华早已完成政治认同的转向,年轻一代华人出生于泰国,在政治甚至文化上都认同于泰国。泰国法律、政策也平等对待华人,随着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华人政治参与意识和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就是一例子。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是泰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大都冷漠以对,但在1992年5月抗议示威运动中他们首次敢于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是该次运动的主要支持者^⑮。本来若要全面考察华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还应该包括考察华人的政治取向、舆论变化等内容,但因资料所限本文暂时无法做到。

影响泰华参政的因素分析

泰国华人政治参与有其自身特点,无论政党还是个人都不以种族旗帜相号召,而是以泰人福利为依托,由此显见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程度之深。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华人参政的积极表现与以下一些因素息息相关。



越南《投资报》2003年12月15日报道,截止2003年11月20日,新加坡在越南仍有效的投资项目283个,注册资金73.6亿美元,名列各国和地区在越投资第一位,菲律宾在越南投资项目2.23亿美元。在贸易方面,2003年越南向新加坡出口额约达10.2亿美元,高于2002年的9.61亿美元;向菲律宾出口额约达3.7亿美元,高于2002年的3.15亿美元,越南从这两国进口价值约达26亿美元,其中从新加坡进口占25亿美元以上。

1. 泰国政府对华人政策、态度的变化是华人政治状况改变的先决条件。

泰国国籍问题较早获得解决,有利于其融合于当地社会。二战前赋予出生于泰国的华人泰国籍的做法在战后基本上得到延续,从50年代后期起也逐渐放宽华侨移民入籍的限制。1975年中泰关系正常化后,泰政府进一步放宽入籍条件。泰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明智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向。

平等的政治待遇是华人能够参与政治的前提。泰国政府对华人公民权利的规定经历了从限制、逐步放宽到最后给予同等权利的演变过程,尤其是1983年大选规定,合法的泰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规定了华人享有与泰人同等的公民权利,扫除了华人参与政治的法律障碍。

2. 泰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华人参政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

1973年10月学生抗议运动直接导致军事独裁统治的垮台,开启了泰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进程。此后,泰国民主化进程虽不平坦,但沙立·他依式的军事独裁统治不再出现。江萨内阁、炳内阁尽管也是军人政权,但都维持半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90年代初军人虽然挑战差猜民选政府,但经过1992年5月流血事件后,泰国基本上摆脱了军人专制统治,至今历届政府都通过民主选举而来。1997年泰国颁布了新宪法,希望以此来保证政治的自由化、透明性、责任性。泰国政治往民主化方向发展无疑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3. 泰民众对华人看法的转变。

随着泰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平等意识逐渐增强,民众对华人的看法有所改观,这也是关系华人政治参与顺利与否的因素之一。

其一,各政党承认华人是潜在的政治力量,在历次大选中华人也是各政党争取的对象。如曾任泰国社会行动党党魁的克立·巴莫就亲自到过华人区以潮州话发表竞选演说,甚至聘请华人领袖陈弼臣、郑午楼等人为该党顾问^⑤。泰民众已能正视华人公民权利问题,泰一学者认为华人子女应与泰人具有同等之权利和义务^⑥。

其二,种族身份已不是评判政治候选人好坏的标准。1990年正义力量党领袖针隆·西蒙在竞选曼谷市长时,有人攻击他具华人血统,但针隆仍然以70多万压倒多数的选票中选。事后该党秘书长的评价表明了种族身份在政治选举中已变得淡化:“这不是我们的胜利,而是人民与民主的胜利,他意味着京畿市民需要正义和公道、

肯为人民效劳而又做出了成绩的市长。”^⑦

其三,部分泰国政治领袖开始不回避自己的华人身份,反映了泰国社会对华人的认可与包容。曾任内政部长的巴曼·阿里绿汕,祖籍潮汕,1989年来华访问并到潮阳祭祖^⑧。前曼谷市长针隆、总理差猜、副总理披猜等都曾表明过自己的华人身份。这虽不代表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了变化,却反映出泰国社会逐渐接纳华人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

4. 华人社会自身的变化是影响华人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述主要从泰国的政治环境以及泰人对华人看法的角度来分析影响泰华政治参与的因素。笔者认为,如果说这些都只是外部大环境的话,那么泰华自身的发展变化无疑也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

尽管学者在有关泰华的同化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争论,笔者以为这些争论更多的是集中在华人的种族特性及文化适应方面,而在政治认同上,大部分华人早已明智选择归化为泰国人,尤其是第二代以后的泰华,他们说泰语,并自认为是泰人,以泰国的利益为皈依,这可以从中外学者田野调查的结论中获知。可以说,泰华在政治上认同泰国,就这一点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人认为泰华这段融入过程是崎岖不平的^⑨。无疑政治认同的转向是泰华能积极参与政治的一关键因素。

5. 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自身赢得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

华人既是战后泰国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70年代以来华人企业家在房地产、百货业、通讯、能源等领域都有较大的发展。岩崎育夫认为泰国存在五种类型的资本:政府资本、王室资本、民族资本、华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其中民间资本主要是华人资本,大约占三分之一,他在分析1988年泰国财阀的主要事业所分布的行业领域后,认为华人资本已经进入泰国的所有产业领域^⑩。1995年,世界华人企业集团核心人物财富超过1亿美元^⑪的有368位,其中泰国有50位,总财富764亿美元^⑫。经济实力的增强客观上会促使华人要求改变自身的社会、政治处境,以经济势力来提升社会、政治地位。

6. 历史传统因素的作用。

泰国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特殊性。温和的同化政策、较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基本上一视同仁的政治待遇,使得华人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华人社会与泰人社会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泰国历史曾出现过由华裔领导的王朝,一些华裔直接参与



越南《投资报》2003年12月15日报道,越南皮鞋行业提出到2005年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05年皮鞋出口金额达31亿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62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5%。

政治,管理国家事务。魏源曾在《海国图志》暹罗条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番,惟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这种历史传统与温和同化政策对泰华的政治参与产生相当的影响。

结 语

要全面评价泰华参政给泰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困难的。笔者认为,总的说来几乎都是正面的影响,尚未发现负面的作用。华人参政无疑有助于促进华人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与团结,加速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 and 国家的形成。在同一国家中,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皆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形成社会政治环境安定的必要条件。而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泰国之所以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跟国内保持政治稳定,没有像某些东南亚国家出现反华排华逆流的干扰,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他信政府领导下,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取得了经济复苏,并在2003年提前归还了世界银行的贷款,从而摆脱了国际金融机构规定的种种限制,为泰国的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外交方面,泰国积极推进东盟一体化,努力实现东盟10+1、东盟10+3的政治格局。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应该说都跟泰华的政治参与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注释:

阿南:《泰国的民主化:从抗议示威到新宪法》,《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Anek Laothamatas,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Thailand: New Patterns of Influence, in John Ravenhill, ed., Singapore, Indone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Volume 2,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P398.

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南岛出版社,第123页。

Akira Suehiro,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P40.

⑪②③ Anek Laothamatas, op.cit., P401、P401、P400.

《泰国政府官员关于华侨问题的谈话》,《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5年第2期。

崔贵强、古鸿廷:《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第94页。

冯子平:《海外春秋》,商务印书馆,第300~302页、第296页。

⑭江白潮:《对泰国华侨华人现状的探讨》,《东南亚》1991年第2期。

⑮⑯陈慧松:《泰国的潮州人》,《华人》1987年第4期。

⑫廖小健:《泰国华侨华人政策评析》,《华侨华人与侨务》1995年第4期。

⑬林荣:《泰国善待华裔华文新经验》,《华人》1989年第7期。

⑭《东南亚华人系列报道·泰国》,《星洲日报》2001年3月24日。

⑮旺威帕·布鲁沙达那攀:《泰国的华人特性》,《南洋资料译丛》1997年第4期。

⑯杨行、李灵:《泰中建交开路先锋泰国基辛格——许敦茂》,泰国,1997年。

⑰⑱《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国华侨出版社,第224页、第404页。

⑲曹云华:《泰国华人社会初探》,《世界民族》2003年第1期。

⑳杨作为:《潮州座山的新陈代谢》,《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

㉑Pasuk Phongpaichit: Technocrats, Businessmen, and Generals: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olicy - making in Thailand, in John Ravenhill, ed., op.cit. p423.

㉒龚宜君:《发展中的东南亚中产阶级:对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与菲律宾中产阶级形成之评价》,中国台湾省:全球化下的东南亚(会议),1998年。

㉓《星洲日报》,1987年3月14日。

㉔陈闻:《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半世纪来泰国华人境遇的演变》,《华人》1990年第6期。

㉕广东华侨研究会:《侨情手册——泰国》,第179页。

㉖潘翎:《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三联书店有限公司,第224页。

㉗岩崎育夫:《东南亚的华人资本与国民经济(上)》,《南洋资料译丛》1999年第2期。

㉘《Forbes》,1995年6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越南《投资报》2003年12月15日报道,据越南计划投资部预计,2003年越南新吸引投资总额约达17亿美元,2002年为14亿美元,另外在2002年仍有效力的投资项目中新追加投资金额增长15%。这样,2003年越南新吸引外资约达30亿美元,创造62万个劳动就业机会。